

歐陽海之歌

金敬迈



歐陽海之款

LT0000318447Y



金敬迈

1247.5
305=2



花城出版社

欧阳海之歌
金敬迈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(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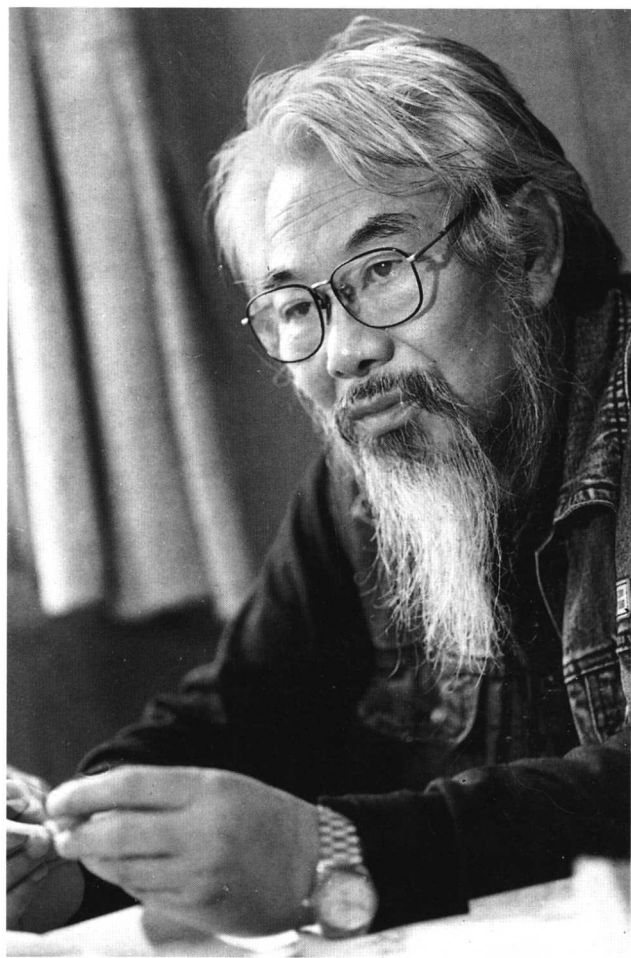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75 印张 2 插页 410,000 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0-2604-8/1·2227

定价:25.60 元

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照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描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英模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烈士生平事迹的长篇纪实小说，是六十年代中期家喻户晓的名作。欧阳海的事迹，曾经激动过整整一代青年的心，其中闪现出的光辉，在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仍然弥足珍贵。对今天的青少年，仍有巨大的教育意义。

再版前言

金敬迈

《欧阳海之歌》是三十二年前——一九六五年出版的。

三十多年来，对这本小说及其作者的褒贬议论似乎一直不断。近年，《炎黄春秋》及广州日报等报刊还发表了长篇文章谈论作者和这本书的沉浮遭遇，误传不少，道听途说亦有之。

有朋友建议，你何必不自己出来“说清楚”呢？

我一想，也是。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三十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，对人生尤其如此。一九六五年至今，黄河虽未改道，我们却历经了比沧海桑田更大的变化，至少我自己从翩翩年少变得老态龙钟，从好强气盛变成与世无争了。

我曾是一名话剧演员，一九六二年底才开始专业写作。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，苦于不能为主人翁推出一个“高潮”，找不到一个“最强音”，当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。一九六三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，完全出于偶然，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“大事故”：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，祸及该连队“四好”也评不上。那年月，评不评得上“四好”可是头等大事。出于好奇，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，

我去到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。

欧阳海是个班长。班里的战士对他的评价可不一般，都说他能干、聪明，作为一个战士、一个班长，事事都很出色。说他“调皮”、“落后”，仅仅因为他爱提意见，和指导员的关系有些紧张而已。

短短五六天的采访，我极其真切极其生动地完成了初学写作所常有所共有的艰难历程：从“衣带渐宽”、从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到“蓦然回首”看见了“灯火阑珊处”的伟大战士。

我已在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“高潮”，找到了“最强音”：和指导员的矛盾，就是高潮；死，就是他的最强音。我急于把它写出来。

我是话剧团的创作员，正业是写话剧，写小说叫“不务正业”。经欧阳海原来的军政委孙正同志为我“说情”，领导上才给了我一个月的创作假，我至今还不明白，我是部队的创作员，地方上称为“作家”，提笔写作是我的本分，干吗要用假期来写？不休创作假，我不也得爬格子吗？可当时，我是千恩万谢，感激不尽的。

夜以继日，用了二十一天，写完了初稿。这在当年，被认为是“快笔”、“神笔”。比起今天的一些年青作家来，我很惭愧，我顶多不过是一只爬得稍快些的蜗牛而已。

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，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，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。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《宣传动态》上，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看见了，说我的体会如何如何，大加赞许，于是，我“红”了起来，开始引人注意了。用今天的话说，是“一颗新星，冉冉升起”。

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鲁易副主编听的。我曾是话剧演

员，朗读是我的本行，读得有声有色，我自己边读边哭，他也泪水涟涟。

鲁易同志说马上付印，我只有这一份手稿，我还想改一改，找人帮我抄一遍吧。记得是找了几位待业的知青，每万字才两元，共需六十元左右。我拿不出这六十元来，妻子翻出她母亲送给我们的两只结婚戒指，去到东山百货大楼旁边的一家玉器收购店。店家说，金子不值钱，上边的两块乌鸡石还勉强可以。于是一只给了二十元，另一只卖了二十三元，总共四十三元。四十三元不等于六十元。妻子下班后开了几个夜车，又替我们家省下了那拿不出的十七元。

稿子正要付印，问题出来了。我的一位老首长、当时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说，小说的后半部要改，欧阳海不能反他的指导员。指导员是“党的化身”，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改好，不好出书。

不出更好。我还嫌写得不够哩。我留下一句话，等我重新深入生活，找到了更好的素材再改。我买了火车票，正准备南下重返广州，鲁易同志把我拦住了，说，你这不是让文艺社为难吗？你三十出头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死活不放我走。有人告诉我，你这么一来，他那副主编肯定当不成了。我真没想到会殃及他人，出于对鲁易的尊重和同情，我退了车票。

两天两夜中，我只迷糊了四五个钟头，一气改写了六万多字。文化部那位领导看后很满意，说，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，听指挥，领会上级意图快，马上付印。告诉他，我会给广州打招呼的。

文化部那位领导大约真的“打了招呼”，我觉得我回广州后似乎——仅仅是似乎——被人另眼相看了。

一九六五年七月，《欧阳海之歌》在上海《收获》上发表，

十月解放军文艺社出书。

书一出来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口就出现排队买书的长龙。刘少奇同志问，印了多少？听说是十五万后，刘少奇同志又说：这样的好书，印一千五百万册也不多。

我很感激。

我真的“红”了。正春风得意呢。但马蹄不能疾。走路低着头，见人先敬礼。心里像念经似的：“皎皎者易污”、“骄傲使人落后”……

一九六六年初春的某一天，领导上通知说，陈老总要接见我。其实前几天，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，已找我去详细交待过，说首长如果发问，你应该如何回答，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。

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同志，陶铸政委和曾志同志，还有吴芝圃、王匡等几位负责人。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，说：“《欧阳海之歌》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。”“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，写得像《欧》这样好的，还是第一部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。是我们文学创作史的一块新的里程碑。”

陶铸也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并希望我能创作出更多更多的作品来。最后，陶政委问我，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映和意见，我汇报说，总政文化部谢锺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：一、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。乞丐不劳而获，是“寄生虫”，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上的区别；二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。他当了国民党的兵，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？三，“最后四秒钟”的描写不好，一定要改掉。告诉金敬迈，这是非改不可的！

我是第一次写小说，不懂，不会，惟那“最后四秒钟”是

我自认为的“得意之笔”，也有不少人夸奖那段描写的。本来嘛，一串灰扑扑的珠子，就这一颗有点亮光。我知道不改不行，但我又舍不得“割爱”。我正在为难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陶铸笑着望望大家：“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，为什么要改呀？”

包括陈老总在內，大家都摇摇头，表示不明白那一段描写错在哪里。

陶铸停了停，然后非常明确地说：“不要改。不要一听什么意见就改。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？今后，关于这本书的修改要先通过我。你是我的兵，我说了算！”

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。我觉得我是得救了。早有陶政委这几句话，我肯定能闯过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那一关。

当然，我更没有料到，正是这件事，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。

书一版再版，很多出版社都竞相印刷，各地的报纸也纷纷连载，以至谢锺忠部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：这本书不该请郭老写书名的！郭老题字不少，但题书名的不多，他自己的书不算，好像就只有两本，一本是《毛主席诗词》，一本就你这个《欧阳海之歌》。我当时真吓了一跳。谢部长还说：查查看，《欧》到底印了多少？可不能超过《毛选》呀！那要犯大错误的！

查的结果，听说只印了两千多万册，离“犯大错误”还有一段距离。

当然，我就更“红”了。报上经常有我的名字，各种会议都邀我参加，而且是坐主席台，车接车送，挺像回事似的，差点就能和今天嗓子不怎么样但屁股扭得很圆的红歌星媲美。看过我的档案，掌握我根底的人，特别是那些政治骨干们，都不

以为然。我心知肚明：这很符合我们民族的心理。

《欧》很红。红在它生动地“宣扬了主席的思想”。初稿中只引了几段“语录”，后来越改越多。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，不好，于是又加进了两段国家主席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引文。我原意稍稍“平衡”一下，决没有搞什么“两个司令部”的罪恶意图。真的没有。

记得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时，在座的王匡就如何宣传主席思想问题，简单地说了几句，意思是书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，还说，再过些年你就会明白了。

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欧阳海的童年和成长，后半部分，生硬地贴上了很多“语录”。评论文章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后半部分大加赞扬。王匡的几句话，有胆有识，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了。那年月，就那个气氛，部队按上级的旨意，搞的就是那一套，也符合当时的“生活的真实”。“活学活用”，目的在神化领袖。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。王匡没明说，我也假装没有听懂。

混乱的年月，糊涂比清醒好。你当糊涂为何物？聪明人才糊涂哩。

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，总政治部肖华主任传来江青的指示，要我去杭州写蔡永祥。

蔡永祥，据说是一位“为保护红卫兵而牺牲的烈士”。这个题材，南京军区创作室早就有人在抓，黎汝清、任斌武等同志都参加了。他们是大手笔，在他们面前，我最多算个学生。可我是江青派去的，身上沾着点“神”味。一到南京，政治部副主任，文化部长立即接见不说，黎汝清等几位同志也马上把他们的采访笔记交给了我，还说“仅供您作参考”。这不是强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吗？这事我可不能干。我提议合作，他们也不干，说这是领导定的，不容我推辞。

对这件事，我觉得不妥，这么办太于心有愧了。有出息的没出息的、有本事的没本事的作家，都不能干这种事。我想，等我采访完了再说吧。反正这事不能干。作家间，最见不得人的事，就是剽窃他人的作品，硬抢比暗剽恶劣十倍。

当然，我也没想到不等这个题材动笔，我就走麦城了，这是后话。

在钱塘江大桥某连队采访了一个多月，收获不大，苦恼日增，撇开烈士事迹中的疑点不谈，我也写不出两个都牺牲在火车轮下的不同的故事来呀！

我打了个报告，请肖华主任转江青，请她在百忙中给予具体指示。

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，接到总政通知，要我立即赶到北京，等候首长召见。当时红卫兵正“大串连”，火车站人山人海，要想上车，谈何容易。

感谢南京军区的同志，为我跑火车票飞机票，总算及时把我送到了北京。

四月十一日上午，我奉命在京西宾馆的对门——军事博物馆的一间休息室里待命。谢锺忠部长、虞棘副部长也在休息室里等着。他们再三交待我，首长问什么答什么，你自己可不要乱说乱问；还说回答首长的问话，声音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，还说首长说的，都要记下来，回来好向我们传达；还说首长很忙，要及时告退，等等，比总攻已经临近，战斗就要打响的气氛还凝重。

我问：“您两位不参加？我一个小兵……”他们说：“首长指定见你，我们怎么能参加呢？”

大约是下午五点多钟，我才被召进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。屋里坐满了人，有周总理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王力、

关锋、戚本禹、姚文元，还有谢富治、叶群等人。江青坐在正当中，我先向江青敬了个礼，然后依次向周总理等领导人立正，手齐帽沿，行了标准的军礼。周总理摆摆手，意思是招呼我坐下。

没等我坐下，江青说话了：“金敬迈，怎么，我提的那几条意见，你不改？你真是个大作家呀！这么大的架子？”

这劈头几句，真把我吓傻了。

京西宾馆的暖气，能把人热死。我穿着一身棉袄棉裤，里头只一件有窟窿眼的棉毛衫，没法脱，在休息室等候召见时，我已经热得浑身是汗，汗水顺着脊背淌，像几条热蚯蚓在背上爬似的。江青这几句开场白，吓得我脸上发烫，脊背冰凉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——江青接着说——“你那‘最后四秒钟’呀，是《雁南飞》！我是为了保护你，看你还是个解放军，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。只要我说一声，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，烧你的书了！”

《雁南飞》我看过，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。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，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，天在转，树也在转，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倒了下去。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，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，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。

这会儿，我才明白江青“非改不可”的意思：“最后四秒钟”的描写，是写了欧阳海“对死的惧怕”和“对生命的留恋”，是污蔑了英雄，是大毒草。

“还有，”没等我缓过气来，江青又说：“书里那两段‘黑修养’怎么来的？是你自己写的，还是谁叫你加上去的？你大胆说，不要怕！不用说，恐怕又是你们那个‘陶政委’的主意吧？我告诉你，陶铸是个‘两面派’，这个人很坏。我每次去广州，他

都要派人跟着我，名为‘保卫’，实际上就是盯梢，是监视。我在广州，是没有自由的。你说，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？”

我连忙答：“是我自己写的，是我自己写的。”

江青说：“我看你就是中‘黑修养’的毒太深。你这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嘛！你这是在搞‘两个司令部’嘛！你到底是哪个‘司令部’的？”

我不能自夸我是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，我更不能说我是“资产阶级司令部”的，这个“两难”命题，我回答不了，看见我一脸尴尬，总理转了个弯，说这是江青同志关心你，爱护你，赶紧按江青同志说的办。总理还说，总政有一个报告，现在有五十万册书印好了，压在仓库里，不删去《修养》中的那两段话，不能发行。积压在仓库里，也是浪费嘛。

“不行。光删去不行。”——江青说——“要消毒，要批判！”

我一脸通红，手足无措。总理出面解围，建议江青先用餐，边吃边谈。

江青说：“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，我今天不会对你这么客气。小说怎么改，还是听总理的。来来来，今天是总理请你吃饭，我们……”——江青环顾周围的人——“我们作陪。”

吃饭时，我坐在周总理和江青之间。总理没有再说什么，江青说了不少，包括说我的名字不好——金和敬连在一起，拗口嘛，没有文化！还说“敬迈”就是敬老家伙吗。同桌的首长都跟着笑一笑，表示赞赏江青的“风趣”。江青还说了些别的，我忙着掏笔记本记录，饭我没吃一口，菜也只象征性的夹了两筷子。整个召见，我再也没感到京西宾馆暖气的存在了，我只觉得浑身发冷。

一九六七年四月，北京已满街是“打倒×××”的大标语，人民日报发表了《爱国主义，还是卖国主义？》后，借《清宫秘

史》对“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的批判，铺天盖地。即使在当时，谁也都知道这是有“来头”的。

就凭我的那点觉悟，就凭我的那点水平，就看我当时的处境，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《修养》中的两段引文，而且进行了批判。对“最后四秒钟”的那点“爱”，也毫不痛惜地“割”掉了。

后来的一切就像我当年演戏一样。不久，我成了首都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；不久，我又兼任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廿五周年”纪念文章的定稿人；又不久，我以“解放军负责人”的身份上了天安门；再不久，我成了“中央文革”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。

负责人没当几天，江青就说：“起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，现在看来，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。”

果然，再再不久，也就是四个月零三天后，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令，以我“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、阴谋反对毛主席”和“趁伟大领袖南巡时，阴谋绑架毛主席”的罪名，将我反铐双手，投入秦城监狱。

在秦城监狱里，十三道铁门，层层锁住，单身监禁，七年零四个月，二千六百七十八天。然后，释放出狱，送河南许昌某农场劳改，四百八十五天——两项相加，三千一百六十三天。三千多天，也算“弹指一挥间”吧！“四人帮”居然倒了。我和江青“交换场地”，她进了秦城一号。

“中共中央专案组”×办公室说：汪东兴讲了，当年收集江青的黑材料，也是错误的，不给我平反。我向“邓大人”申诉，当年我也没收集江青的“黑材料”，更没有反过江青。我还不具备那个水平。

又过了不久，也就是七百三十三天吧，胡耀邦同志下令解

散“中央专案组”，并申明中央今后再也不许搞这类非法组织，这才给我正式平反，公开恢复名誉。

三项相加，三千八百九十六个日日夜夜过去了。

《欧》总共发行了大约是两三千万册。《收获》发给我二千零四十元稿费，解放军文艺社不发，只给了点修改费和样书。我除去还了三百多元的账以及买了一台“上海牌”的收音机外，交了一千五百元党费。一九六七年在北京时，妻子不知从哪儿凑了六百元给我寄去，存在沙滩一个储蓄所里，是给我交伙食费和买烟的。谢富治签署逮捕令时，通令全国所有的银行“冻结”金某人的存款，以为我是个“××万元户”，其实，我们全家就那六百元。三千八百九十六天之后，我满头白发，拿着“平反通知”，步履蹒跚地从沙滩储蓄所取回七百三十九元五角八分，这一百三十九元五角八分的余额大约就是利息吧。我真后悔，早知在秦城一号呆这么久，存定期就好了，定期的利息会多得多。
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就是缺乏预见性。忘了存定期，就是一例。

一九七八年正式平反后，遵解放军文艺社之嘱，将《欧》又删改了一遍再再版。

我想把书中的“语录”也全部删去，不为别的，至少它有断章取义之嫌，且不是我们倡导的正确学风。《修养》我也没加上。但对《修养》的那段不敬，我删去了。我是先于中央为少奇同志平反之前删去那段不敬之辞的。

历史真个无情。历史真会作弄人。当年有句词儿叫“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”。睡在我们身边的“赫鲁晓夫”当然是坏人，毋庸置疑，可谁能料到睡在“赫鲁晓夫”身边的“我们”当中也有坏人呢？而且远远不止一个两个。

我是个小兵，少沾为妙，图个安宁。

《欧》的再再版，原说是一九七九年前就出书的，可我去南边打完一仗回来之后，书还没出来，原因是我为再再版写了篇后记，无非是发了几句牢骚，喊了两声冤枉。当时主持总政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首长、老部长看了后不满意。出于对我的爱护，要求把整篇《后记》删掉。我一时想不通，也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，骨头里钙质增加，变得硬了点，我把修改稿往包里一塞，对文艺社不辞而别，回到了广州，重演了当年对那位已经仙逝的副部长未能演成的一幕。

这位老部长可不和我一般见识。他又耐心地派来沈西蒙副部长找我谈话。在南边打仗时部队调动频繁，军务倥偬，千差万错，沈西蒙副部长没能找到我，只好托人捎话。

一九七九年，我在外地出差，文艺社派人来从我老伴手中把修改稿取走。出于对老部长的尊重，我还是妥协了。《后记》也改成那么几句话。今天我“翻案”，那不是我心里想说的。不是！

一九七九年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重播《欧阳海之歌》。我随《神州风雷》剧组去北京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的演出活动时，见到了邓颖超同志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前不久，听到天津台又在播《欧阳海之歌》，我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。这些年我们到处打听你，知道你是被他们抓起来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只可惜总理在世的时候，没能再次见到你。”我对周总理和邓大姐非常敬重。当年我去文艺组，是陶铸向总理推荐，总理把我调去的。这一点也使江青耿耿于怀，一直以为我不是他们的人，直至将我锒铛入狱。

《欧》的再再版，一九七九年底前开始发行。三中全会之后，大量平反冤假错案。随着彭老总、陶铸等冤死的英灵得到昭雪，